哲 学 研 究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哲学思考

杨　河

(南方科技大学,广东 深圳 518055)

摘　要: 习近平提出的“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战略判断,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反映了世界百年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历史走向,体现着历史的辩证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方式,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深入研究,对于我们在民族复兴道路上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 大变局;民族复兴;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主要矛盾;辩证否定

中图分类号:B 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1)05-0041-13

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①这是对世界历史发展态势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判断,如何理解和把握“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做多方面的研究和分析,哲学的理论思维必不可少,本文试就此作一些初步探索。

一

在现象层面上看,“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进入 21 世纪以后,百年来世界各种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基本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是世界经济格局重心从环大西洋经济带向环太平洋经济带转移;二是世界政治格局重心从“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家独大向多极化演变并出现了新的态势;三是在上述变化中,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使国际力量对比从“西强东弱”历史性地转向了“东升西降”。但是,2007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2020 年初新冠疫情的发生,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横行等,使正在进行中的变化具有诸多不确定性,世界历史的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进入动荡变革期。这种变化中的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中的变化相互交织,是“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象态。

“大变局”根本在于“变”,那么这种变化何以可能发生?

根据唯物史观,人类社会一切变化的根源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其中根本的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分析大变局的原因,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考察,主要是新科技革命的发生和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前者提供了推动大变局形成的历史动力,后者提供了实现大变局的历史机遇。

收稿日期:2021-07-20
作者简介:杨河,男,江苏徐州人,南方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项目编号:13&ZD001)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28 页。

科技革命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在近代逐渐呈现出来的。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史中,自从铁器被发明和运用后,生产力的发展极为缓慢,几乎没有突变式飞跃,直到 18 世纪 60 年代以蒸汽机大发明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发生,人类文明的进程才进入了快车道。英国通过这次在本土发生的工业革命,引领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霸主。19 世纪下半叶以电的发明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劳动生产率再次大幅度提升,科学和大批量生产的方法不仅影响了工业,也影响了农业,英国由于未能及时适应这次工业革命的要求,被德国和美国赶超。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它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具有多点突破、范式转变、数字化转型、国际参与增强和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速等新的特点,必将导致世界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如同前两次工业革命一样,这次工业革命也将深刻影响人类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人的社会关系的革命,引发制度创新和思想变革,使世界各国综合实力对比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世界格局重组。能否适应新的科技革命的要求,跟上新的科技革命的步伐,站在新的科技革命的前沿,引领新的科技革命的发展,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和进步步伐,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的地位。

经济全球化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最初的踪迹可以追溯到古时的国际贸易交往,中国就曾经通过输出丝绸和茶叶与西方通商贸易,18 世纪的德国学者将这条道路取名为丝路。后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通商贸易受阻。15 世纪到 17 世纪,为了发展新生的资本主义,西欧国家开始海上探险以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史称“地理大发现”,由此拉开了全球交往的序幕。工业革命的发生启动了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工业、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世界市场加速扩大,使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大大超过历代水平。但是后来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打断了全球化的进程,冷战中“两个平行市场”的对立,又限制了全球化的展开。

全球化的全面展开是在冷战结束以后才形成的,随着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互联网的建立,大大缩小了各国和各地的距离,加速了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交换,世界多边贸易体系的建立,使各国经济越来越融为统一的整体,并带动了人类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更为普遍的全球交往。

从历史上看,经济全球化启动于发达国家,是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先进科技为手段、以获取最大利润和经济效益为目标、以跨国公司的贸易和投资活动为平台,各国在世界市场分工与协作相互融合的过程。这个形成机制使全球化本身带有二重性,一方面,它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加速了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有效配置、资本和商品在全球的自由流动、科学和技术在全球的广泛传播,为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可以通过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可以通过吸引外资,扩大建设和就业,使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可以利用不断拓展的国际市场解决产品销售问题,以对外贸易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还可以借助投资自由化和自身比较优势组建大型跨国公司获取更大的利益等,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另一方面,它作为资本的国际化过程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是资本逻辑即资本积累规律的展开,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下,占据资本和技术优势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推行零和博弈的结果将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总体差距进一步拉大,一些最不发达国家被“边缘化”,甚至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新殖民地。

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使之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加速了世界格局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能否把握经

济全球化的规律和趋势,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趋利避害,因势利导,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同样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的地位。

正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矛盾的张力中,科技革命在深层次推动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得以展开,引发了人类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调整和变化,带来了世界经济、科技、政治、文化力量的相互作用和综合演化,使世界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18 年 7 月 2 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的讲话中谈到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指出:未来 10 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 10 年,将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 10 年,将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 10 年。① 这是对大变局深刻原因和丰富内容的高度概括。

二

科技革命在经济全球化中推动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这个过程是如何展开的? 列宁认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②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大变局”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形成? 二是“大变局”是在什么历史境遇中演化?

关于第一个问题,一百七十多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欧洲封建社会后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孕育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③。这个时代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通过变革封建制度,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取代了”④,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从以往的各民族的发展史转化为具有统一性的世界历史。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只是“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它也必然受到“剥削逻辑”的历史制约。当生产力越来越社会化时,雇佣劳动的“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不可避免”。⑤

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这个历史“大势”,是我们观察和分析“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历史背景。尽管马克思逝世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会更加长期复杂,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人类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规律之中。只有将“大变局”置于这个历史“大势”之中,我们才能够清楚它的历史地位和走向。

关于第二个问题,马克思逝世以后,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生产的进一步集中,促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调整,“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⑥。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国际贸易主要方式,资本主义时代从自由竞争阶段走向了垄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第 444—445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3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01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02、405、404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03、406、413 页。

⑥ 《列宁全集》第 2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01 页。

断阶段。世界历史在 20 世纪初跨入了新的“百年”。

这百年世界历史,波澜壮阔而又跌宕起伏,大体可以以冷战结束为界,分为上半期和下半期。上半期,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发生、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是重大历史事件。下半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新的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是重大历史事件,当今世界的“大变局”就存在于这个复杂的历史发展境遇中,是它的产物。

如何梳理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写道:“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①

世界百年来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这与资本主义时代主要矛盾的问题是一脉相承的。《共产党宣言》中对此有一段论述,在分析了资产阶级通过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这种历史情况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②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没有明确讲“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主要矛盾,但是,作为资本逻辑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世界范围的表现,将它理解为世界主要矛盾,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分析的。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也指出:“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③

这里的东西方,有地域含义,但实质上是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性概念,是资本主义国家(西方)与非资本主义国家(东方)之间的矛盾,这是人们后来提出的东西矛盾和南北矛盾的共性的总的概括。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主要矛盾有一个展开过程,其意义,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帝国主义阶段也有所不同,但是从一开始,它就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是西方资本主义分解和破坏东方国家落后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程,客观上刺激了这些国家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素的生成;另一方面,“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又是西方资本主义将这些东方国家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目的,并不是要把落后的东方变成先进的东方,而是为了寻求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以及商品销售的市场,使资本获得更大的利润,因此,它们要将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控制在资本的势力之下。

1914 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百年来世界发生的第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从现象上看,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世界主要矛盾,但是根源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是东西方问题,是帝国主义之间对如何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争夺全球霸权的较量。没有帝国主义,就不会有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有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就会有帝国主义战争。

列宁在大战中写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区分是帝国主义时代世界人口的基本划分,“这正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所在”④。后来他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再次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2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04、40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74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81 页。

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①这个论断,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资本主义时代主要矛盾是东西方矛盾的确认。

战争的后期,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推动了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欺凌压迫的国家人民的觉醒,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在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将《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发展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②,这意味着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汇合,从而使东西方矛盾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一方面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另一方面是被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的矛盾。

这两个方面,主导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其一,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虽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但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最后结局虽然与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密切相关,但是被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矛盾的最终解决,要取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解决。

十月革命的胜利在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同时也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从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转变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起始。它预示了世界未来的变化,将决定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力量、两种制度、两种文明在对立统一关系中相互博弈的结果,这是东西方矛盾的根本性质。

三

从东西方矛盾特别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在世界历史中的演变来分析大变局的发生,焦点是双方相互地位的此消彼长,这是大变局发生的时空“节点”,因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③,矛盾双方主次地位的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必然随之变化。

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在东西方矛盾中处于主要方面,西强东弱,这是历史形成的。欧洲封建社会的历史比较短,分封制以及王室和教会之间长期的权力争斗,使欧洲各国的历史发展中难以形成大一统的、具有稳定性结构的制度体制,有利于新的生产关系的孕育形成;而商贸和海洋文明的发达又使得欧洲各国在频频发生的宗教和军事冲突中保持着一种对新技术的要求,最终引发了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形成的新思想的导引下,通过顺应时代潮流的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欧洲新生资产阶级确立了先进于东方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走到了历史的前列,引领了时代的发展。

但是这种在历史条件中形成的历史地位也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百年来,两次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得世界历史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二战后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过渡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兴起,为各国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历史机遇,能否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抓住历史机遇实现发展,对东西方各国都是考验,其结果,决定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和世界格局的走向。

由于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的优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启了百年世界历史进程,但是,其固有矛盾也随之展开且愈加深重。新的工业革命将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提升到了更高的水平,而垄断则使生产资料更为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两者关系尖锐化的结果是:财富的大量增长与贫困的大量积

---

① 《列宁全集》第 3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32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3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23 页。

累同时并进,经济危机一次比一次更深重的发生,金融资本的统治使资本主义在进入垄断阶段后显露出了寄生、腐朽与没落。百年来,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严重的“长周期”经济危机就有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得到缓解,美国利用在战争中特殊地位走到了前列。在自然资源较充裕的情况下,技术进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农业增产、消费扩大、对外贸易兴旺,股市持续向好,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从 1923 年至 1925 年的年均 100 上升到 1929 年 6 月的 126,一片繁荣景象。然而仅过了 3 个月,美国金融界突陷崩溃,股票一夜之间从顶巅跌入深渊,成千上万美国家庭的积蓄在几天内烟消云散,这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经济事件,影响波及整个西方世界,使其工业生产倒退到 1900—1908 年的水平,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长达 10 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为了应对危机,主张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主导地位。

第二次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 50 年代中后期到 70 年代初,借助第三次工业革命和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反周期”政策即在私人经济出现不能盈利而面临破产时,政府应通过增加开支或减税来进行干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进入了新一轮高涨。美国利用大战后的“财大气粗”地位,一方面主导成立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与黄金挂钩,确立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获取了经济增长和繁荣。另一方面,实施“马歇尔计划”,使西欧经济得以复苏,又帮助日本进行了“民主化”的社会改革,利用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需求,日本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阶段。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环境中,政府干预的作用是受资本积累规律制约的,为了刺激有效需求,西方发达国家采用不断扩大财政开支和低息借贷政策刺激私人投资消费,致使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引起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持续上涨。20 世纪 60—70 年代,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财政赤字巨大,国际收入情况恶化,美元的信誉受到冲击,爆发了多次美元危机,被迫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大幅度提高原油价格,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 1944 年《美国对外石油政策》报告的设计建立的石油霸权也随之终结,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潜在的危机随之爆发成为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持续三年的石油危机对美国等依靠廉价石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极大冲击,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形成了低经济增长率、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并存的“滞胀”局面。

第三次发生在 21 世纪初。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政策失效,因为“滞胀”的一个重要原因被认为就是政府过度干预导致政府膨胀、行政开支增加、企业税赋加重,于是,长期被冷落的古典自由主义经过改造,以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面貌登台亮相。

新自由主义延续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三个基本原则:一是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二是私有化,认为个人利益是经济发展的根源;三是市场化,认为只有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但是,在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和凯恩斯主义的冲击、面向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新自由主义也在理论上对政府与市场、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上做了一些改变和调整,以适应历史条件变化的需要。

20 世纪 80 年代,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分别以自由化特别是以金融自由化为中心和以国有企业私有化为中心进行改革,取得了成效,重新复兴了美国经济,缓解了长期困扰英国的经济疲软问题。

随着英美等国走出“滞胀”危机,新自由主义影响日盛,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潮。1990 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国家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形成了以新自由主义原则为主导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主张推行以美国为主导的全

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此后,美国利用各种经济和政治手段向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华盛顿共识,使新自由主义从一种理论学说转化为美英国家意识形态。正如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所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①

“华盛顿共识”提出之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经济全球化大潮兴起、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等,扩大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巩固了它在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统治地位,甚至被神话为“包治百病”。苏东剧变后,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的胜利,谓之为“历史的终结”。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的确,新自由主义在凯恩斯主义“失效”的情况下,暂时“挽救”了西方资本主义当下面临的危机,但是作为垄断资本实现更自由的最大化利润的一种理论和政策,与古典自由主义一样,新自由主义也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新的尖锐化。

在“华盛顿共识”出台之前,拉美国家就被作为了新自由主义的“试验田”,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发展缓慢、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动荡不安,还接连受到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困扰。80 年代尤甚,被称为“失去的十年”。

苏东剧变之后,俄罗斯联邦政府采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提出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休克疗法”经济转轨方案,结果在 10 年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经济大幅度滑坡,前苏联积累的大量社会财富在私有化中被少数人攫取,广大民众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下降,政局陷入混乱,综合国力大不如以前。

2007 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过度投资次贷金融衍生品的公司和机构纷纷倒闭,在全球范围引发了严重信贷紧缩的金融危机。随着虚拟经济的灾难向实体经济扩散,世界各国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激增,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世界经济遭受重大损失,成为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至今余波仍在,复苏缓慢。

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破灭了新自由主义的神话,曾经信奉过新自由主义的日本学者中谷岩在《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中写道:“这次金融风暴暴露了全球化资本主义本质性的缺陷。考虑到当今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食品污染、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全球化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巨大的修正。如果允许我说得更严厉些,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自我崩溃了。”② 20 世纪 80 年代末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事实面前也改变看法,认为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跌下神坛,自由主义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将受到审判。

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过分强调金融自由所导致的金融监管缺位、系统风险低估和评级机构失职,但是根本原因还是新自由主义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长期以来形成的美国国内 99%的老百姓与 1%的富豪之间、世界南方发展中国家与北方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表明,虽然这次金融危机始于消费领域特别是房地产领域的信贷扩张,但说到底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致。

为了尽可能避免由于经济剥削所导致的生产过剩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发生,维护资本循环,榨取更多剩余价值,资本不断向国外扩张,将国内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扩大到世界范围,资本积累规律得以在国际范围内发生作用,形成了财富和收入分配在资本主义国内外两个范围的两极分化。这两个两

① 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季海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 页。
② 中谷岩:《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郑萍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3 页。

极分化相互作用,不断加深资本主义经济在生产和消费之间、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不断压缩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国际扩张以缓和国内矛盾的社会空间,不断破坏资本再生产在世界市场的实现条件,其结果,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阶级用以避免危机的种种办法,“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①。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正是资本主义在东西方关系中历史地位变化的总体趋势。

相反,百年来,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发展中国家在历史大潮中经历了磨砺,逐渐发展壮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苏联的诞生,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聚集和团结在社会主义的旗帜,第一次在整体上形成了与资本主义集团的对立面,揭开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危机的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横跨欧亚大陆的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对峙,特别是人口占全人类近 1/4 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习近平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兴起,就是当时的世界大势。我们党从这个世界大势中产生,走在了时代前列。”③

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下,民族解放运动先后在亚洲、非洲和拉美兴起并取得胜利,一系列国家获得独立,第三世界崛起,世界旧殖民体系崩溃。发展中国家联合反帝反殖反霸,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一时间,“东风压倒西风”,撼动了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格局。

但是,建设社会主义远非易事。四十多年的“冷战”发生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兴起的历史时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根本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固守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自觉深入的改革,未能充分适应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及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再加上党的自身建设出现严重问题,官僚主义和特权意识滋长,脱离了人民群众,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压力和渗透下,意识形态领域出现指导思想的错误,最终导致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国际共产主义遭遇重大挫折。

苏联解体以后,冷战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孕育的新的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现实。④ 美国利用所占据的新技术革命高地、经济全球化的支配地位和军事威慑力量,一家独大,西方重新巩固和强化了其优势地位。然而,世界历史自有其发展规律和趋势,苏东剧变的大动荡必然带来大调整,大调整必然带来大变局。这场剧变客观上启动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主导这个大变局发展趋势的重要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顺应时代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0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第 874 页。

③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 年第 7 期,第 10 页。

④ 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新的时代主题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追求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二是指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应该解决但是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势,吸取苏联教训,走出“苏联模式”束缚的改革开放中形成的。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的制度优势、时代给予的机遇优势和历史积淀的后发优势,适应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要求,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通过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战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2020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接近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70%左右,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中国的成功经验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殖民化浪潮中获得独立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通过自己的道路不同程度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21 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接近 40%,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80%,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①

2008 年,主导世界治理的机构由“八国集团”扩大为“二十国集团”,在这之前,二十国集团会议只是由各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参加,主要就国际货币政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世界经济发展问题交换看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会议提升为领导人峰会,标志着全球治理开始从“西方治理”向“西方和非西方共同治理”转变,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化的重要表现:

其一,在力量对比上,近代以来“西强东弱”的世界格局正在经历“东升西降”,朝着“东西均衡”方向发展,推动着世界多极化进程。很多以前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先后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实现了工业化,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力大幅度提升,摆脱了从前作为西方列强“附庸”的地位。

其二,在国际关系上,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增强和地位的改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主导的国际关系规则体系正在被改写。国际关系史上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等,虽然都强调以平等和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但实质上都是强权至上,缺乏公正合理性,特别是对东方国家多有“强加于人”,难以有效解决当今和平与发展问题。中国政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代表着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合作共赢、共建共享发展的方向,塑造着新的国际关系秩序。

其三,在未来发展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被美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左右当今世界东西方格局演变的核心关系。不过,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考虑不是要“再版”冷战格局,而是要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坚定不移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致力于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携手共建一个远离恐怖、普遍安全,远离贫困、共同繁荣,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为世界格局的重构和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案。

2020 年初开始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场疫情加速和加深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一方面,它影响了全球化在时空中的继续展开,使得“大变局”具有了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它又展现了“大变化”的发生,中美两国政府在疫情中对待民众生命的两种不同态度、不同决策所带来的不同结果,使人们切实

---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中国制度面对面》,北京:学习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23 页。

感受到了两种制度和治理体系在社会修复能力上的差异和世界的变化。

四

百年世界历史风云变幻,大国的兴衰是重要内容和重要标志,中国的变化,具有独特的意义。

古代中国,农耕文明长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汉代中兴、唐代盛世、宋代繁荣,明朝郑和七下西洋,航迹遍及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强盛被周边各国所景仰。根据西方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估算,公元 1000 年(北宋时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 22.7%,随后一直保持在 20%左右,到 1829 年达到 32.9%。

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开始孕育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从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 1905 年的 66 年中,侵华战争不断,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列强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一个比一个苛刻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把一个独立的中国一步一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往日的辉煌不再,中国陷入了衰落的深渊,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否定。李鸿章从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敌、蒙受数千年未有之大辱而谓之:“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

中国的衰落,确有器物问题,这是工业革命造成的差距,中国当时落后的农耕技术和家庭手工业生产,无法抵挡资本主义先进的大规模机器生产所形成的军事力量,但是根本还是制度问题。到清朝中后期,过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在历史周期率中已经逐渐耗尽了它的内在生机,妄自尊大、闭关自守的政策使中国错过了跟上工业革命的机会;陈旧的封建制度又压抑了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僵化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意识形态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政治黑暗、民生凋敝、国防空虚、财政拮据、社会动荡,已预示了危机的到来。

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解决制度和技术落后问题的民族复兴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篇主题。但是,通过什么道路去争取民族独立,又通过什么道路去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赶上时代和引领时代?这是民族复兴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的根本问题,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是检验中国一切政治力量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基本依据。没有正确的道路,民族复兴任务就只是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即。

为了寻求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经历了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多次努力失败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通过新文化五四运动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最终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①

作为一个对中国历史规律和历史主题有着高度自觉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②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

①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 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 页。

大奇迹,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大踏步赶上时代,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长期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其基本经验,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这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这种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真实地体现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即一方面,要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公平正义与环境资源保护节约程度不断提高的统一;另一方面,要实现社会良性发展、人民共同富裕与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不断得到积累的统一。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在 2021 年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走在时代前列,这将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

1962 年 1 月 30 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预言: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世界将会发生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巨大变化,“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② 五十多年后,行进在“两个必然”历史进程中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行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正在印证着毛泽东的预言。

五

历史的变迁是从可能走向现实的过程,有着必然和偶然的辩证统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如此,如同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中长期共存、相互对峙、有所借鉴、各自发展仍是基本态势。资本主义还没有“走完”它的历程,社会主义也还正在“展开”它的生命力。“两个必然”的最终实现,尚需要人类实践的发展提供满足突破“两个决不会”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告终”,还将继续经历“分娩”前的长期“阵痛”。相对于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才存在四百多年,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也才一百多年,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完成了它所能完成的一切而转向衰落的这样一种状态”;“这个时代将延续多久,我们无法断言”。③ 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④

在分析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时列宁提醒我们,“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

---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 13—14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02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2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6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06 页。

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 ①甚至“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国家或在某些时期内”会出现“惊人迅速的发展” 。②

因此,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不可能“宽阔、畅通、笔直,在走向胜利的途中根本不必承受极其重大的牺牲”③,相反,“要经过艰巨的、长期的斗争”④,既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也会有“‘和平’龟行发展”的“政治消沉”时期⑤。

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革命发生的条件会更加复杂,积累的时间会更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当今主要问题将集中在已经获得革命成功的国家如何巩固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由于一些国家生产力低,小农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资本主义不发达,这些国家“在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立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的可能”⑥。相对于夺取政权,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更为困难和曲折。苏东剧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多么不容易”找到,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民族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过去已经付出,现在还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提出,21 世纪头 20 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二十年来,我们利用这个机遇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二十年后,面对国内外新形势新变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当前我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需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思想和工作方法上树立系统观念,保持战略思维。

一是要坚持战略眼光。今日中国,不是与世界之间关系中的中国,而是世界之中的中国,是世界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大势紧密相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蕴含着历史机遇,又带来了风险挑战,只有深刻认识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总揽全局,放眼长远,向前展望、超前思维、提前谋局,才能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随势而谋,顺势而为。

二是要坚定战略自信。今日世界,已经不是几个西方发达国家可以随意操纵的世界,而是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中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世界的大势存在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重要内容,又是重要推动力量,只有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战略定力,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办好自己的事,才能在大变局中砥柱中流,引领潮流。

三是要坚守战略底线。大变局中的中国同世界,都处于矛盾运动的新常态中,世界在动荡变革期中

---

① 《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436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0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5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3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09 页。

⑤ 《列宁全集》第 26 卷,第 78 页。

⑥ 《列宁全集》第 3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7 页。

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与中国在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这些因素在现实中的表现具有某些偶然性、突发性和暂时性,使“大变局”显得“摇摆不定”又“扑朔迷离”,但却是“大变局”的题中之义,因为它们大都仍然根源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与东西方矛盾的延续密切相关,是中国的发展必然会遇到的风险和挑战。只有确立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的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才能把握趋利避害的主动权,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胜利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n the Viewpoint that “The World is Experiencing a Great Change Which Has Been Unseen Over the Last One Hundred Years”

Yang He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dong Shenzhen* 518055, *China*)

Abstract: The significant strategic judgment that “the world is experiencing a great change which has been unseen over the last one hundred years” made by Xi Jinping has a profound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the movement of basic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world over the last one hundred years, and embodies the dialectics of history. Using Marxist philosophical way of thinking, we must make an in-depth study and revel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gration of reality with history, and theory with practice. This is of a great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us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change, scientifically deal with the change, actively seek the change, breed preemptive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in a crisis, and open up a new stage in a changing situation on the path to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 great change, national rejuven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jor contradiction, dialectical negation

(责任编辑　刘曙光)